

东莱文明的



吴绍田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序

出版一本关于平度历代碑刻研究的集子，缘于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冲动的冲动。

我不是平度人，来平度工作之前，对魏碑、王舍人碑虽有所了解，但并不很深。2000年1月，我来平度后，因为做宣传工作，所以对平度的文化，当然包括平度的碑文化也就接触得多了一些。2001年“五一”节前的一天，我去青岛办完公务后，想到书店补充点“精神食粮”，意外发现了由辽宁美术出版社根据郑述祖《天柱山铭》拓片整理出版的字帖。我原以为《天柱山铭》出自平度，出版事宜一定是平度人所为。可没想到，当我回到平度问及此事时，博物馆的同志却告诉我，郑述祖的《天柱山铭》早在1968年就被某村村民采石毁坏了，平度根本没有拓片，博物馆只有后来从某村猪圈墙上拆下来的三十几块残石，总共不过一百九十几个字。听到这些，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觉，就像吃东西时被卡住，咽不下又吐不出。

从青岛回来后，我趁“五一”节放长假的机会，与几个朋友一起造访了大泽山。大泽山内，现存上溯东汉，下贯北朝、宋、元、明、清等代的摩崖石刻300多处。每一处都记录着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同时又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向人们展现着书法艺术的美。正是这些，赋予了大泽山钟灵毓秀、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以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大泽山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一朵奇葩。我想，同我一样，凡是来过大泽山的人，在尽情地享受大泽山自然美的同时，无不从众多的摩崖石刻中得到惠及。另外，平度历史悠久，文人荟萃，贤俊代有，名人辈出，所以，散存于民间的碑刻也极具规模，这为平度的历史增加了文化的厚度，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为此，在从大泽山回来的路上，我忽然萌生出一个要对平度历代碑刻进行研究的念头。说与朋友，大家一听便动了心，并表示愿意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想，通过我们的工作，不仅能使更多的碑刻避免郑述祖《天柱山铭》的恶运，更重要的是其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用，为我们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所用。

开展对平度历代碑刻的研究，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对平度历代碑刻进行排查筛选，而且研究的前期工作关键是田野调查，吃功、吃力、耗时、耗资，再加上研究者的“业余水平”，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2001年9月份，我决定除利用各种力量继续进行“排查”外，暂时放弃关于碑刻研究的其他工作，而将主要精力投放到《源远流长的东莱文明——大泽山文化研究》一书上。此项研究是根据建设平度文化大

市的需要而进行的，作者全是热心于平度文化的业余作者，有的已经退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研究于2002年7月份完成。9月份，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以“源远流长的东莱文明——大泽山文化研究”为题正式出版，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同时也为我们开展碑刻研究提供了经验。

2003年1月，市委换届，我的工作由宣传改为组织。如果说过去做宣传工作，业余搞一点研究，比如像碑刻研究，还与宣传文化沾点边，也算分内之事，而改做组织工作后，则大有“不务正业”之嫌。在我的一些朋友中，有持反对态度的，但更多的是持赞成态度。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我还是做出了继续将研究搞下去的选择。我想：做官是一时的，而能够利用现在的一些条件为平度文化事业做点事，可能惠及百年。至于能否因此而影响工作，我只好以“问心无愧”作答。我深信，在一定条件下，文化与工作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文化也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使我们文化的追求，不仅不会影响工作，而且会促进和推动我们的工作。

二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明确其范围和特点，研究其内在运动、发展的规律。对平度历代碑刻研究，同样要在上述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梁白泉先生在为金其桢先生的《中国的碑文化》（重庆出版社，2002年1月版）一书作序时，首先是从石头的作用说起的。他认为，石头可以作为物质生活的材料来使用，就是制工具、建房屋、造桥梁、筑堤坝等。作为意识形态、精神生活的需要来讲，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石头被用在刻画祭祀岩画，制作墓碑、墓志、记事碑、记功碑、界碑、盟会碑、告示碑和各类艺术品，还可用来刻记天文、星相、地理和各类文学艺术经典等等。而碑刻包括三个要素：第一，石头；第二，文字或图画；第三，刻在石头上（少数也可能用颜料涂绘在石头上）。因此，它又可分为三类：第一，刻字的长方形立石；第二，刻字圆首、上小下大的石头（碣）；第三，刻字的岩壁。他还认为，“石刻”不等于“石碑”，“石碑”定是“石刻”。在“碑文化”中包括“摩崖”，就必须对“石碑”作广义的理解。金其桢先生在他的《中国的碑文化》一书中，对中国碑文化的渊源和分类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他认为：碑，早在春秋时期即已有之。只是汉代以前石刻文字不称为碑，而称为“刻石”。它是从无字、无一定形制的“竖石”原始碑，发展为汉代有“刻辞”、有一定形制碑这一演化过渡时期中碑的主要表现形态。而自汉以后演进发展到清代，碑的含义已引申、扩展为刻石、碑、碣、摩崖、墓志、刻经、造像记、塔铭、石阙铭、题名、桥栏桥柱题记、井栏题记、祠堂（享堂）记事、墓

刻于石上、埋在墓中的买墓地的契约)、界石、画像题字、石刻字帖等一切有文字的石刻和线刻图画碑的总称。在上述广义的“碑”的各类石刻文字中,“碣”是“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品种和阶段。摩崖则是刻在山崖石壁上的在“碑”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总的他认为,刻石、石碣、摩崖从广义上来讲都属于碑的范畴,是无一定形制的碑,它们既是无字、无一定形制的原始碑向后世有刻字、有一定形制的碑进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作用,同时又是碑的两个分支。他特别强调,如果将刻石、石碣、摩崖与碑刻割裂开来,乃至仅仅将有刻字、有一定形制的碑视为碑,而将刻石、石碣、摩崖排除在碑之外,显然是片面的,不符合碑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客观事实的。

实在地说,在开始我们的研究之前,或者直至今日,我对关于“碑”的知识知之不多,按理说不敢妄论。但今天我作为一个不甚够格的“研究者”,又不得不在浩如烟海的各种学术观点和理论中作出选择,并去加以阐释。我赞成上述的观点。我认为,研究碑文化,必须从广义的视角来研究整个碑的大家族,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的碑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关于对平度历代碑刻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一概念下统一,又在这一概念指导下展开的。

三

本书将研究分为碑记、摩崖、墓志、题记四个部分。

(一) 碑记类

平度古代碑碣林立,历经战乱、风雨剥蚀和人为毁坏之后,仍留下很多有价值的石碑。《汉王舍人碑》是国家一级文物,在书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珍之等造像碑题记》对解读胶东地区佛教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早在1958年,即被故宫博物院收藏。通过对碑记的研究和考证,不仅能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历代的重要历史人物,还可补充正史之不足。

(二) 摩崖类

在山崖石壁上题字留诗是文人雅士的传统,天柱山上留下了自东汉至元代时期的石刻十余处,尤以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主持刊造的《郑文公上碑》、《东堪石室铭》和其子郑述祖留下的《天柱山铭》等石刻最为知名,《郑文公上碑》被康有为尊为“圆笔之极轨”,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天柱山摩崖石刻早在1988年就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泽山素有“鲁东名山”之称,山中300余处刻石,大多都有较高的书法欣赏价值。明洪武年间全国高僧曾在此集会,留下的偈语刻在山上,形成著名的“书法走廊”,被誉为佛教兰亭盛会。其他如云山、桃花涧、豹竹涧等地也都留下

了不少摩崖石刻，不仅装点着美丽的山川，还昭示着当地丰厚的文化底蕴。

（三）墓志类

平度历史悠久，文人辈出，但随着年代的久远，加上缺乏文字资料，许多历史文化名人逐渐为人们所淡忘。通过考证这些人物的墓志铭文，可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生平，提升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增加地域文化厚度。这些墓志的书丹人都是当时的书坛高手，所作篆额和碑文大都风格典雅，是学习书法的很好范本。值得注意的是，墓志与墓碑有很大区别。墓碑立于地表，是给活人看的，碑文内容基本上尊重史实；墓志深埋地下，一般情况下难见天日，墓志内容大都有谀墓之词。我们在解读墓志铭文时，要正确分析理解，并结合历史背景加以判断，以免受其误导。

（四）题记类

题记类内容极为丰富，举凡匾牌、坊额、楹联、题名等无所不包。题记大都出自名家之手，有较高的书法欣赏价值，一直为人们所喜爱。通过对题记刻石的深入研究，可进一步了解古代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和民风民俗，对了解平度历史上各个时期艺术家的书法艺术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里，我要指出的是，目前已出版的许多关于碑刻的著作，大多注重碑刻的书法艺术研究、欣赏，而对碑刻的历史价值、社会功能、文化内涵等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著作，尚不多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书试图将平度碑刻文化置于数千年中国特别是胶东地区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从单一到综合，从微观到宏观，从零散到系统，从表象到内涵，从历史到现实，从碑的政治、历史、宗教、社会、吏治、教育、科举、地理、建筑、书法艺术、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研究、考证、剖析其蕴涵的丰富的人文内涵、功能、作用和价值。这对于解读胶东地区这种沿海文化与内陆文化交汇的“海岱文化”的独特的文化类型，揭示胶东地区特有的文化特色、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随着岁月的流逝，存世的碑刻会愈来愈少，因此也会愈来愈珍贵，对其进行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其中现实的意义也不言而喻。

最后，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平度的碑刻文化是大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对平度历代碑刻研究，是对大泽山文化研究的深化和继续。因此，我们将结集定名为《源远流长的东莱文明——平度历代碑刻研究》。

吴绍田

2003年11月于畦园



目录

一、碑记

1. 汉王舍人碑 / 002
2. 东汉碑记残石 / 008
3. 北魏王珍之等造像碑题记 / 010
4. 元崔世荣神道碑 / 012
5. 明重修三元庙碑 / 017
6. 明重建大泽山智藏寺碑记 / 021
7. 清康熙敕赐刘应田祭葬碑 / 026
8. 清重修大泽山日照庵碑记 / 028
9. 清重建大泽山聚景台石亭碑记 / 030
10. 清重修大泽山智藏寺碑记 / 032
11. 清重修日照庵梳洗楼碑记 / 034
12. 清道光诰封白克敏碑 / 036
13. 清重修崇德宫碑记 / 039
14. 清夏连甲道碑 / 042
15. 清吉灿升捐廉助士子乡会试路费碑记 / 046
16. 清重修玉皇庙三清阁碑记 / 050
17. 清“彤管扬芬”节孝碑 / 053
18. 清合屯公立民约碑 / 056
19. 清重修玉皇庙碑 / 059
20. 大泽山日照庵功德碑林 / 062
21. 民国谢万禧碑记 / 064
22. 民国刘松石先生道碑 / 067
23. 民国祝家铺修桥碑 / 069
24. 民国重修蔡齐墓碑 / 072
25. 民国立卢弘胤墓碑残石 / 074

二、摩崖

1. 汉天柱山中平三年刻石 / 078
2. 郑文公上碑 / 080
3. 天柱山东堪石室铭 / 089
4. “此天柱之山”题字 / 096

- 
5. 天柱山“上游下息”题字 / 099
 6. 天柱山铭 / 101
 7. 天柱山颂 / 106
 8. 宋秦元似大泽山诗刻石 / 108
 9. 宋朱巽《宿大泽山早起》诗刻石 / 111
 10. 金莱州节度使游智藏寺题记 / 114
 11. 元《云山老人归真记》刻石 / 115
 12. 元云山“长春子”诸刻石 / 118
 13. 明大泽山僧人偈语刻石 / 120
 14. 明大泽山佚名诗刻石 / 126
 15. 明豹竹涧云台观刻石 / 128
 16. 明邹善大泽山诸刻石 / 131
 17. 明沈九畴、崔淳游大泽山题记刻石 / 132
 18. 大泽山邀月台诸刻石 / 134
 19. 明崔燾《雨霁》诗刻石 / 138
 20. 明龙文明大泽山诸刻石 / 140
 21. 明宿凤翥等大泽山“方水石”诗三首刻石 / 142
 22. 明宿凤起《慧尊禅房》诗刻石 / 144
 23. 明王之都大泽山“瑞云峰”榜书刻石 / 146
 24. 明王之都大泽山“乳泉石”长联 / 148
 25. 明文太青大泽山诸刻石 / 150
 26. 清万代尚大泽山诸刻石 / 154
 27. 清张含辉大泽山诸刻石 / 156
 28. 清戴圣聪大泽山诸刻石 / 158
 29. 清郑板桥大泽山“孤峰独秀”刻石 / 160
 30. 清何凌汉大泽山“书藏万卷”刻石 / 162
 31. 清张舍白氏大泽山诸刻石 / 164
 32. 民国李笑山豹竹涧“细乳”刻石 / 168
 33. 民国于乐三豹竹涧诸刻石 / 170



三、墓志

1. 金徐方墓志铭 / 174
2. 明张霄墓志铭 / 178
3. 明官贤墓志铭 / 184
4. 明官一夔墓志铭 / 186
5. 明李学诗墓志铭 / 190
6. 明张永贞墓志铭 / 194
7. 清陈肇墓志铭 / 198
8. 民国张鹏举墓志铭 /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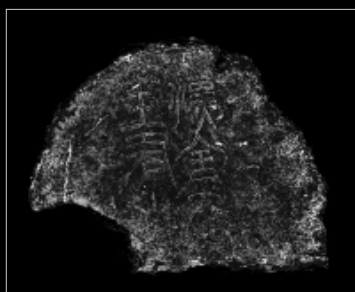
四、题记

1. 东魏姚保显造石塔记 / 208
2. 明戴新牌坊题额 / 210
3. 明重修千佛阁题记 / 212
4. 明刘重庆大泽山智藏寺题联 / 214
5. 清喻成龙大泽山《聚景台》诗刻石 / 216
6. 清舒士贵城隍庙长联 / 218
7. 清翟云升隶书刻石 / 222
8. 清许樾“忠义祠”题额 / 224
9. 民国沙梁《文昌阁记》 / 226

附录：平度现存历代碑刻一览表 / 230

后记 / 248

源远流长的东莱文明



碑记

平度历代碑刻研究

汉王舍人碑

■ 崔传富 ■

汉王舍人碑，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立。1982年冬在平度灰埠镇侯家村出土。上部碑文残缺，现残高110厘米，宽78厘米，厚21厘米，碑文隶书，计12行，行19字不等，左下部另有款识“光和六年四月乙酉立”独占一行，清晰可读者尚有186字，现存平度市博物馆。

此碑碑额雕螭，刻工精美，上有竖排篆字两行，因下部残缺，仅存6字，从残存篆字及汉人题额惯例推测，碑额应为“汉舍人□王君之□”，“之”下疑为“碑”字，另缺一字无考，或者此处本来就没有字。苏州华人德先生疑此处或为碑穿，也很难定论。

碑主王君，为汉舍人。《周礼·地官》有“舍人”之职，掌宫中之政。秦汉置太子舍人，皇后、公主属官亦置舍人。《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所指就更加宽泛。碑上部残缺，碑文难以通读，因此碑主是什么舍人，难以断言。于书亭先生据碑文中“……灵台之格，展浑仪之枢”句，推测其为灵台待诏之一，根据是《后汉书·百官志》注中引《汉官》的一段话：“灵台待诏四十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风，十二人候气，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钟律，一人舍人。”汉有灵台，在长安西北，为观察天象之所，“候星”、“候日”、“候风”、“候气”云云与碑文中“考异察变”之句相吻合，因此推测此王舍人为太史令属官。于书亭先生多方考证，将此碑定名为《汉王舍人碑》，1986年由齐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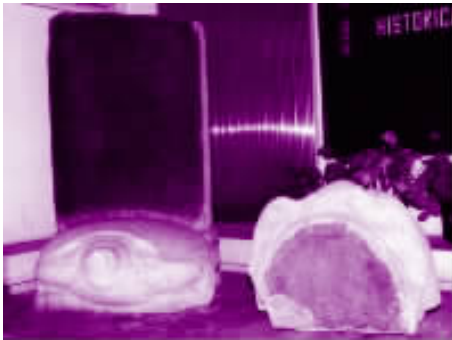


图1 汉王舍人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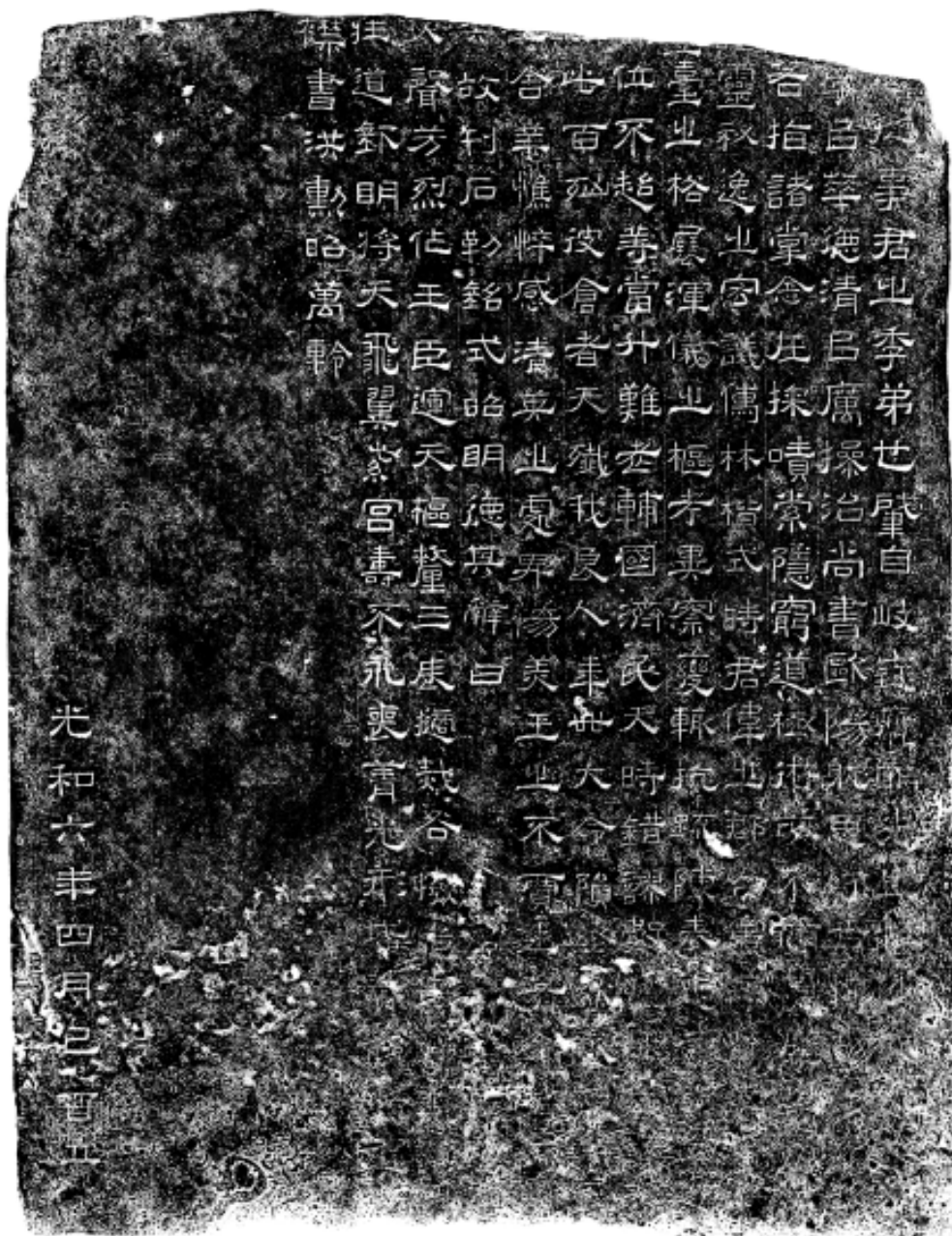


图2 汉王舍人碑拓片

社出版了单行本，并在国内外有关杂志上作文介绍，引起了书坛的广泛关注，佳评如潮，此碑也成了平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王舍人碑》的奇特之处，是其在能够见到的汉碑中首次使用了龟趺。汉碑的碑趺一般作长方形，使用龟趺则较为少见，据华人德先生考证，在此碑出土前，能够见到的仅有四川的《樊敏碑》。此王舍人碑龟趺长125厘米，宽90厘米，高33厘米，造型古拙，线条流畅，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是一件难得的圆雕艺术精品，为研究汉碑的形制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隶书发展到东汉时已臻纯熟，《王舍人碑》也不例外。其书风婉约峭丽，又不失朴厚自然，在汉隶风格中，属端庄典雅、静穆安祥一派，与《礼器碑》、《史晨碑》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于其他东汉碑版的明显之处，一是在笔画上夸张了“蚕头雁尾”的笔势，使横画波磔更显奇纵瑰丽。横画和捺画收笔时向上大幅度挑起，特点非常明

显，为其他汉隶所少见；二是在结

字上一反汉隶扁方之常格，有意

拉高了字形，形成了自己的

独特风格。东汉末期的隶

书取势，一般是左右

开张，字呈扁形，此

碑隶书结体基本

呈方形，笔画安

排上密下疏，

重心居下，结

字稳重大方。这

种字体取势开启

了楷书的先河，

是学习隶书的极好范本。



图3 汉王舍人碑碑额拓片



图 4-1 汉王舍人碑拓本选页



图 4-2 汉王舍人碑拓本选页



图 4-3 汉王舍人碑拓本选页



图 4-4 汉王舍人碑拓本选页